

船棺，为呈现古蜀文明提供实证

本报记者 付鑫鑫

日前，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区大弯镇双元村春秋战国墓地考古发掘工作收尾。在近一年的科学勘探及发掘中，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联合青白江区文物保护中心共发掘清理墓葬180座，出土文物千余件，包括青铜器、陶器、漆木器、少量玉石器。540多件青铜器中，有鼎、壶、敦、盂、釜等容器，钺、剑、矛、戈、双剑鞘等兵器，斤、凿、锯、削等工具，还有带钩、铜环、双鱼等小物件。这些青

铜器大多保存完好，纹饰精美，整个墓葬群堪称一座“地下青铜器宝库”。体量最大的154号船棺墓中，出土数枚青铜印章，其特征与成都市商业街1号棺出土的印章特征非常接近。而商业街船棺墓葬被认为是战国早期古蜀国开明王朝王族，甚或蜀王本人的家族墓地，由此推断，双元村154号墓主身份也相对较高。

李白曾在《蜀道难》中写道：“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感慨始终成谜的古蜀文明。而此次，双元村船棺墓葬群，从春秋中晚期延至战国中晚期，横跨200余年，其墓葬数量之多、随葬品之丰富，为进一步揭开古蜀文明的神秘面纱，研究古蜀的历史文化、丧葬习俗以及东周各诸侯国间的交流往来等提供了重要史料。



成都市文物考古工作队正在发掘清理船棺“棺王”中的遗物。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

饰有龙纹、虎纹、蝉纹、花蒂纹、手心纹的青铜兵器；蟠螭纹、涡云纹清晰可见的青铜尖底盒；带有明显修补痕迹、楚风浓郁的青铜鼎；双剑鞘中“附赠”回首龙纹小飞刀；刻有巴蜀图语的环首刀……在四川省成都市青白江博物馆地下一楼库房，记者见到了青白江区双元村春秋战国墓地出土的540余件青铜器，蔚为壮观。

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论起这次墓葬群的发现，还得从两年前开始说。青白江区文保中心可移动文物保护部负责人兰玉龙是最先接触考古工地的几个人之一。

在办公楼遇见兰玉龙时，他刚从双元村考古工地回来。就在食堂午饭的空档，他接受记者采访说，2015年10月，为配合成都建工商综物流园一期（100亩）项目的建设，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青白江区文物保护中心联合对该基建工地进行考古勘探。

2016年3月进场时，兰玉龙及同事在基建工地的东北部，即物流园一、二号库房位置做勘探时发掘土层中有异样。“我们先是发现了一座船棺墓，里面还有两件青铜器，当时很兴奋，立即上报给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经专家确认，墓葬属于战国时期。”兰玉龙说，经过上报国家文物局，去年5月，考古队和文保中心组织人员，重新密集勘探，初步判断约有几十座墓葬。

伴随着发现的墓葬越来越多，出土文物也越来越丰富。比如说，11号和15号墓出的青铜器特别多，尤其是青铜剑、青铜釜等。个别墓葬里，还发现了墓主人的牙齿和人体的指骨。王天佑说，如果想从牙齿、指骨的DNA来还原古蜀人的族源，恐怕只能耐心等待科技考古的结果。此外，有的墓葬还出土了梅花鹿的后腿骨，以及桃核、稻谷和瓜子。“动物考古专家判断说是梅花鹿的后腿骨，我在现场也不认识；桃核，倒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稻谷、瓜子是在实验室用显微镜看出来的。

有十多年勘探经验的兰玉龙说：“判断一个地方是否有墓葬，主要依据是土质。钻探器取土上来，在纵切面上看，哪一层是未经人为搅动的生土，还是有人类活动痕迹的花土？颜色不一样，看得多了就有经验。之前，在靠近青白江区的新都区，我们也发现过商周遗址，所以，这次考古勘探特别留心。”

如果说刚开始的几十座墓葬是“得来全不费功夫”，那么，在圈定的范围内找全190座墓葬并划定清楚每一座墓葬的边界，则是让王天佑及其团队累下了一番力气。用王天佑的话说，“鬼知道我们经历了什么！”

夏季上工地，必须早起，趁天凉爽，抓紧时间清理发掘；过了中午，太阳直射，恍若炙烤。王天佑说：“像我这么胖的人，夏天上工地，汗如雨下。遇上雨季，发掘到一半的墓坑里全是积水，又得抽水，否则，‘浑水摸鱼’把遗迹都破坏了。我们过的日子，简直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

2011年参加工作的张光磊，也是文保中心的工作人员。“我跟着考古队一直在找墓。天晴时，工地上的回填土和生土几乎没有颜色差异。只能打井抽水，或者‘靠天吃饭’盼下雨，把地面浇得微湿，回填土的痕迹才能显露出来。”张光磊看了看外面阴云密布的天空说，“像今天这样的天气就很宝贵，前几天都下小雨，土地微湿，不粘脚，正好辨认回填土。土地太湿了也不行，一脚下去全是泥，痕迹都搅乱了。”

为巴蜀文明框架提供“血肉”

天气好时，考古队员一天能找几个墓；天气不好，几天也寻不着一个。

“冬天‘刮地皮’，特别干，工地的黄沙土又细又粘，刮一次不放心，还得刮第二次，生怕有什么遗漏。”张光磊说，他还兼职摄影，去年为拍好船棺墓全景，经常爬四五米高的梯子。“家用的铝合金梯子，两三个人在下面扶着，我一个人爬上去。遇上地不平，扶梯子的人一动，我就吓得不行……像王天佑老师那样的身材，也要爬梯子拍照呢，我得学习。今年初，文保中心买了无人机就方便多了。”至今，张光磊仍然懊恼，清理“棺王”时，自己不在现场。

次日清晨，王天佑领着记者上考古工地，一睹“棺王”的真容。乍暖还寒时节的春风，在开阔的工地上，呼啸而过，带来堪比冬天的凛冽寒意。工地约有两个足球场大，王天佑直奔中部的“棺王”。据介绍，180座墓葬中，墓坑长度不等，最长的超过8米，最短的仅1米多。从墓葬的形制、葬具、随葬品等综合分析，墓主身份存在不同的等级划分。“棺王”编号为154号，墓坑长8.2米、宽2.1米，船棺长6.3米、宽1米。

在“棺王”旁边，地上还有一副楠木棺盖，中间是两个大窟窿。王天佑说，那是盗墓贼打穿棺盖留下的盗洞，经时久远，盗墓的年代已不可考。棺体静静地躺在2米多的土坑中，周围一圈全是青膏泥，隐隐地泛着绿光。

王天佑说，“棺王”揭开前，他和同事们兴高采烈地杀鸡吃肉庆祝一番。“我们还讨论说，希望能出个竹筒、木筒之类，解读巴蜀图语；或者多出些漆木器等等高等级文物呢。”

腊八节，青白江区大雾。众人合力抬起“棺王”棺盖，棺舱内满满的都是淤土。慢慢清理发现，有精美的漆木器、青铜兵器。王天佑用手示意说：“朝北树根那端是人头枕着的地方，朝南树枝那端是人脚，青铜兵器分布在中间腰部位置。树枝部分两个半圆形的凹槽是榫口，和棺盖上的凸起两两相合，保证密封性。其他开口部分，也用青膏泥缝合，防止地下水渗入。”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陈云洪说，所谓船棺就是将截成段的木头，从中间一剖为二，上三分之一做棺盖，下三分之二雕凿成独木舟形，作为葬具，装殓尸体及随葬品。船棺最早出现在西周晚期，在春秋战国时被巴蜀人广泛使用。秦灭巴蜀后，蜀人南迁，关中汉人入蜀，木椁墓、木棺墓逐渐兴起。西汉初期，船棺基本消亡。

“以往，成都周边出土的船棺墓多是战国时期，春秋时期较少。这次，双元村墓葬中，发现不少春秋时期的文物，为巴蜀文明演进的脉络提供了更多的‘血肉’支撑。”陈云洪说，“换句话讲，以前，我们可能只是知道一个大体框架，这次发掘提供了更多内容来充实框架。”

东晋常璩撰写的《华阳国志卷三·蜀志》中，记有：“周失纪纲，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后有王曰杜宇……（遂）禅位于开明……开明位号曰丛帝。从帝生卢帝。”王天佑引述道，古蜀国延续几百年，不可能只有“点到为止”的几位帝王。此次出土的青铜器涵盖春秋战国时期的主要器型；从青铜器和漆木器上的纹饰推断，蜀国与楚国文化交流密切；横跨200余年的墓葬群有助于清晰呈现东周时期古蜀国的历史脉络、丧葬习俗和对外文化交流史。

专家访谈

军政王权取代神权政治 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江章华 谈古蜀文化的自我调适

文汇报：作为我国西南地区先秦史方面的专家，您能否简要介绍一下，目前已知的古蜀文明大体框架？

江章华：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脉络大体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以成都平原史前城址群为代表的宝墩文化（公元前2500—公元前1700年）；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公元前1700—公元前1200年）；以成都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公元前1200—公元前700年左右）；以成都商业街船棺、独木棺墓葬为代表的春秋、战国青铜文化（公元前700—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以后，辉煌独特的古蜀文明融入汉文化圈，至汉武帝，古蜀文明几无痕迹。

目前，巴蜀地区春秋时期的相关资料较少，而在青白江区大弯镇双元村发掘的船棺墓中，有春秋中、晚期墓葬，出土了不少遗物，因此，我们认为它很重要，为清晰呈现春秋时代的古蜀历史与文化提供了重要实证。

外来青铜器是原装“进口货”

文汇报：这次出土的千余件文物中，有540余件青铜器，其中多是兵器 and 实用器，反映了怎样的时代特征？

江章华：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多数是宗教象征物和仪式用器，比如，青铜面具、大型金器、玉器等。到了西周晚期，战争逐渐频繁，为了应对新的政治环境和“国际局势变化”，古蜀社会进行自我调适，开始出现转型——三星堆文化和十二桥文化（金沙）时期的神权政治逐渐衰落，代之而起的是至高无上的世俗军政王权。

在新的形势下，三星堆与金沙那种因神权政治的需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从事的各种宗教祭祀活动已无暇顾及，无力生产那些华美的宗教神器，青铜原料主要用于制造兵器和实用器。这一转变自然也引起了全社会整体观念的转变，保家卫国成为维系社会的精神纽带，是全社会的凝聚力所在，此时，对人的重视程度明显高于神权政治时期。

从西周晚期至春秋战国，作为仪式用具的青铜器物逐渐减少，玉器只余少量装饰品、戈、矛、剑等兵器和斤、凿、锯、釜等实用器物比较多，这在双元村春秋战国墓中体现得十分明显。

应对战争是当时社会的头等大事，这从等级最高的墓葬到普通民众的墓葬多随葬兵器可以反映出来。它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古巴蜀也许不像秦国、楚国那样拥有专属的军队，普通民众平时为农，战时为兵，以保家卫国为荣。

文汇报：如果墓葬中都出土青铜兵器，那么我们怎么判断墓主人的身份高低和墓葬的确切年代呢？

江章华：要判断墓葬的年代，主要依据是陶器。在古代，陶器因其制作成本低、易耗品的特质，随时代变化快，不同阶段的特征明显不同。根据类型学，比对新出土的陶器与之前已知时代的陶器器型，来判断墓葬大约处于哪个时期。比如，巴蜀地区，春秋陶器有盘口罐、大型尖底盒；战国早期，尖底盒变小了；战国中期则出现了陶豆。

而青铜器因其制作成本高，使用时间长，器型变化不够明显，作为断代依据不如陶器准确，除非是个别时代特征鲜明的青铜器。

战国时期，古蜀社会有着复杂的社会分层，处在不同阶层的人死后墓葬规模不同，尤其在随葬器物上有着明显的区分。其中，奢侈品的种类、多寡是区别不同等级身份的主要表征物。奢侈品以中原和楚文化风格的青铜器为主，只有统治阶层才有能力得到和制作这些东西，他们借此彰显自己特殊的荣誉与

地位。就像现代，有钱人才能开“进口车”，中原、楚风的青铜器在古代巴蜀就好比“纯进口”的舶来品，不是一般民众可以拥有的。

巴蜀印章应是护身符

文汇报：公元前316年，秦灭巴蜀，蜀人南迁，蜀地文化与中原文化互相融合。那么，如何判断春秋战国时代的青铜器，到底是“原装进口”的奢侈品，还是巴蜀自有产品？

江章华：可以从青铜器的类型、形态特征做区分，巴蜀式、楚式、中原式各有不同。比如，巴蜀式的矛是柳叶矛，配有双耳。剑的装柄方式也与中原式不同。

巴蜀自有青铜器的一大特征是巴蜀符号，或称“巴蜀图语”。巴蜀符号主要出现在青铜兵器上；其次是印章；最少是工具。

兵器上的巴蜀图语分为三类：一是具象类，蟠纹、虎纹、鸟纹，战国早期开始出现；二是半抽象类，手心纹、花蒂纹组合出现，战国中期以后常见；三是全抽象类，如水波纹、亚字形、树枝纹三者的组合等，出现在战国中期偏晚。抽象类的巴蜀图语，时间越晚越普遍。

兵器上的虎纹、龙纹、蝉纹等符号的主要功能，当不是装饰作用，应与某种神秘的精神信仰有关，在三星堆文化和金沙文化中也有类似的象征物。到了春秋战国时代，虽然神权政治已经消失，但古蜀人心中仍保留着古老的神话传说与信仰。他们相信这些神秘的符号具有神奇的力量，能够增强兵器的神奇威力，佑护战士，增强战士的作战信心。这在人类学中有许多印证，比如，许多原始部落出征前要跳舞，还在身上和兵器上画各种神秘图案，以期所向披靡、无往不利。

文汇报：双元村春秋战国墓出土有8枚印章，您对印章上的巴蜀图语怎么解释？

江章华：这次出土的印章，我还没看见实物。不过，根据以前发掘出土的印章看，巴蜀印章流行于战国晚期，流行地域以川西南为主，其次是川东北，成都地区相对少见。

印章上的巴蜀图语主要是王字、双斧、山形、菱形勾云、带形等五种图案的变幻组合。一般，墓主人身份特殊的墓葬才出印章。鉴于几种图案的重复出现，个人认为，这些青铜印章不像现代人的姓名私章，也许与古蜀人的信仰有关。他们相信，印章是护身符，生前佩戴身上，死后随葬墓中，从中获得庇佑。后来，中原汉字引入巴蜀，基本为吉祥语或警语类，有些巴蜀符号印开摹仿汉字印的日字格和田字格形式，但仍然使用巴蜀符号。

文汇报：双元村墓葬群、成都商业街船棺，加上之前的三星堆、金沙文化，为什么考古都在发掘墓葬，却没有遗址？

江章华：在巴蜀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多见墓葬，少见遗址的确是客观现象。个人推测，可能与秦汉时期兴修水利、开垦农田破坏遗址有关。

在成都平原上，秦灭巴蜀后的第二次大规模移民发生在西汉初，移民万家就食蜀汉。而汉代的遗址也发现较少，墓葬较多。这可能跟唐、宋时期的农业、水利、房屋建设造成的破坏有关。



双剑鞘附带的“回首龙纹”小飞刀。



青铜戈上的龙虎纹饰若“龙盘虎踞”。



青铜矛上分别饰有蝉纹、鸟纹。



环首刀柄上饰有犀、龙、鸟纹，并用巴蜀符号间隔。



巴蜀印章上的几何纹饰，并不多见。



楚文化典型代表——青铜敦，说明墓主人的身份等级较高。（除署名外，均本报记者付鑫鑫摄）



双元村春秋战国墓中出土的漆器，“回首龙纹”的图案美艳大方。（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供图）